

技术资本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

罗甜田 王 琴

摘要:技术资本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演化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形式、商品类型、劳动形式,消费形态都由于与新技术的深层次互动而发生巨大变化。围绕技术创新,技术资本主义得以建立了与传统工业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经济范式,构建了独特的“资本—技术”生态,并借此使资本的扩张力量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技术资本主义理论试图揭示新兴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塑和改造作用,以及科技创新主导的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经济样式、文化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总体性影响,图绘当代资本主义作为“资本—技术”综合体的基本面貌。技术资本主义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虽然仍存在一定不足,但它为我们理解当代变化莫测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既不同于“文化—意识”形态分析,又有别于传统技术批判理论的分析框架。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识技术资本主义概念下科技创新和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既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把握,也是对资本主义未来的一种展望。

关键词:技术资本主义;技术创新;全球化;跨国公司;积累机制

作者简介:罗甜田,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琴,成都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21)07-0019-12

资本主义在 21 世纪正经历着快速的演变,这种转变既缘于金融资本、信息技术驱动全球化纵深发展,又可归因于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生产关系的重塑,其结果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生产要素、积累体制的嬗变,并最终对现代世界造成各种冲突性的影响。如何理解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一变化?相较于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之上的传统工业资本主义,建立在信息技术、虚拟金融、专利控制之上,表现为“技术—资本”复合体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世俗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义体系建设研究”(ZYG X2014J115)。

的当代资本主义又有何种新的特征与运行机制? 在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权力—经济”秩序下, 掌握技术创新资源的大型跨国公司是否日益凌驾于个体和社会之上, 成为一种更具强制性和扩张性的力量? 对于上述问题, 纯粹的技术理性批判、技术文化关系批判是难以给出完整解答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超越 20 世纪“技术—文化”批判的研究方式和研究纲领, 在全球化、技术创新、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新背景下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分析, 并提出了“技术资本主义”的概念来图绘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辨析和理解技术资本主义的内涵在当下尤为重要, 它既有助于我们更好透视以美国为首的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 还能够帮助我们从一个角度理解技术创新与当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复杂共生关系。

一、技术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

技术从诞生那一天开始就是在改善人类生存困境的名义下发展的, 以理性精神为内核的科学技术在启蒙运动中更被历史性地解释为驱动整个人类族群进步和飞跃的力量。关于社会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的社会影响之争论由来已久。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图谱中, 技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可以被视作最高意义上的革命性力量。在 1847 年写作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 马克思明确地将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产业结构、社会形态变迁联系在一起。“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 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 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 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 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①可以说, 科学技术作为核心要素贯穿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历史进程的考察之中, 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也因此作为度量被马克思用来划分渔猎社会—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自动化时代。这一做法为后来者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领域, 奠定了这一类型研究的基础理论框架, 使得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与批判来说, 科学技术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后来的晚期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金融资本主义, 以及当代传播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等概念都与之相关。

围绕上述概念的理论研究不断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技术统治的社会, 这种技术统治不仅仅体现在哲学意蕴层面(如海德格尔所述的“构造现代世界的技术”), 也不只是马尔库塞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扩张和渗透于社会管理、文化艺术、个体日常生活中的压迫和控制, 还体现在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对技术与资本主义共生关系进行重点考察的经济层面, 即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渗透反映在基本的经济和生产关系之中。技术资本主义的概念所指代的正是当下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所驱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形态。按照技术资本主义的概念解释,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借助不断催生科技创新的市场体制, 将无形的人类创新成果进行商品化和市场化, 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全球化市场—跨国公司—科技创新”循环的“资本—技术”复合体。在这一复合体中, 技术创新、跨国公司和全球化市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222 页。

如同传统工业社会中的工厂和大机器生产系统一样,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技术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有着较为复杂的各方面因素,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 3 点。

第一,技术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和 20 世纪技术批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道格拉斯·凯尔纳率先提出技术资本主义(techno-capitalism)的概念,其最早在《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中论及这一概念,随后又进一步使用这一概念来辨析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试图用一种新的理论图谱来描绘新技术浪潮与资本主义社会演化之间的紧密联系。技术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从生产关系、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角度深度、系统地剖析资本主义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因此必然溯源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考察之上。马克思对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考察,一开始是以对资本问题的探究为出发点的。按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技术之间关系的阐述,“货币—商品—货币”的关系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就是因为资本从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中获得剩余价值的力量。资本主义与科学技术最初关系的奠定,就得益于手工制造业中的技术创新。劳动力的集中和劳动精细化分工的产生、简单机器的应用,都会促进交换价值的生产。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每一个个体的资本家将不可避免地去尽量减少用于补偿劳动力工资成本的劳动时间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在这种结果不是靠工人的过度劳动取得的情况下,资本的一种趋势就是:力图用尽可能少的花费——节约人力和费用——来生产一定的产品,也就是说,这是资本的节约趋势,这种趋势教会人类节约地花费自己的力量,用最少的资料来达到生产的目的”^①。这形成了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特殊关联,技术创新通过提升劳动集约化和商品生产效率来服务于资本的扩张,并接受资本的规训和整合。技术资本主义概念的核心内容是作为商品的技术创新和服务于技术创新的整个公司组织与市场机制,不断再生的创意与发明作为一种无形的资产为资本转化效率提升和劳动效率提升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技术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和理论探讨因循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与科学技术关系的认识,着重探讨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探究技术对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综合影响,最终直接服务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凯尔纳提出技术资本主义概念及理论为例,在凯尔纳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技术与资本高度联合的整体,技术资本主义依赖于科技创新和智力资产,并最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基本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和批判精神,指向的是技术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在理论的批判路径上,无论是凯尔纳还是当代诸如 Luis Suarez-Villa 等以技术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的学者,都未简单因循 20 世纪占据主流地位的纯粹批判理论路径,而是先后选择从经济学分析、生产关系批判、产业形态分析入手来探究技术资本主义的兴起缘由与本质规律,体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与‘后’思想相反,凯尔纳的‘技术资本主义’理论在承认当前社会经济、政治、阶级结构、文化等领域发生巨大变化的前提下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本积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19 页。

的强制性原则仍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②因此,技术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技术资本主义理论还受到了20世纪广泛传播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影响。发端于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的技术统治论强调技术的本质是一种解蔽,座架于技术之上的社会之根本特征是同质化和单一化。技术统治论是对19世纪高歌猛进的技术决定论的反思和批判,“人们发现未来连同自身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技术手中。‘技术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系统的、科学的和精心安排的对人和自然的统治’,技术在发展中出现了戏剧性的悖反”。^③技术资本主义同样继承了20世纪技术批判理论的这一气质,强调不断走向虚拟化的资本主义非物质生产正在侵蚀人类的内在本性,不断地加剧人与技术的对立和人的异化。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技术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控制技术和技术创新的企业体制也成为加害者。“我们的创新、智识和我们的学习能力变成一种商品,使得我们越来越与外在自然背离,越来越与我们的内在本性疏离。人之价值的贬抑不仅源自于科学技术本身,也源自于科学技术的结果。它根植于全新的企业体制的独有特性,以及其对于科技力量的全面占有。”^④

第二,技术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源于辨析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重大变化的理论需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掀起了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再次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颠覆式的影响。数字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基因技术介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领域。这一系列技术的共同特征是建立在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和信息化处理技术之上,就此建立的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并不依赖传统工业生产所依赖的原材料、机器设备、体力劳动者,取而代之的是对专利、研发、数据的渴求。按照丹·席勒的说法,诸如互联网之类的信息技术最重要的成就是使资本主义的矛盾现代化。新兴技术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追求利润最大化、劳动控制、生产效率等基本规则,但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的盈利来源、投资场所、劳动力技能、升值和贬值的劳动类型、商业消费的形态、资本和国家的各自作用以及社会阶级的关系都与之前完全不同。^⑤他将这一变化称为资本主义内部的相变。从外在的表现来看,资本主义生产经济活动走向了虚拟化、共享化和去中心化。“我们看到大量扩散的新术语,如‘零工经济’‘共享经济’‘按需经济’‘下一次工业革命’‘监测经济’‘应用经济’‘眼球经济’等”^⑥,这些变化无论是海德格尔、马尔库塞还是后来的技术理论批判者都是无从预见的。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彻底走上了这一内部相变的道路,即脱离了笨重的传统工业经济模式,向灵活的、由智力劳动和数

② 颜言:《批判的社会理论及其当代重建——凯尔纳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250页。

③ 谢玉亮:《马尔库塞:乌托邦思想的现代性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39页。

④ Luis, S., *Technocapitalis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rpor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⑤ 丹·席勒:《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网络与尼克松时代》,翟秀凤译、王维佳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0页。

⑥ 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3页。

据驱动的精益商业模式迈进。建立在信息技术和海量数据上的新兴技术使得资本主义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性和延展性,技术创新创造出永动式的、无限发展的生产模式,驱动当代资本主义演化成为一个空前庞大的“资本—技术”综合体。根据现有统计,仅仅是互联网的用电量就占据了将近 10% 的全球用电量。美国代表性的几家高科技企业无一不是“资本—技术”的庞然大物。诸如亚马逊、苹果等高科技企业手握数千亿美元现金储备,市值甚至超过了许多中等发达经济体股市的全部市值。美国政府和政治精英也将这些企业在全球市场的领先地位视作自身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为维护其优势地位不惜动用各种行政命令打压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技术理性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化身,代表了技术资本主义与无数商业公司、跨国集团的利益、权力和价值,因此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呈现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多维度色彩。

上述变化并不是最终结果而仍是一个充满着冲突和不确定性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尝试以技术变革和技术创新为中轴来辨析当代资本主义演化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由此提出了“信息资本主义”“传播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等概念。在这些新的理论概念中,技术或者某种特定技术形式的产生和应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当代资本主义演化的主要驱动力量。与上述理论相比,技术资本主义更加注重从资本主义演化的连续性、发展的整体性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趋势,探究围绕技术创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革,以及技术驱动下的文化、经济、政治转向,并未聚焦于某一种特有技术或技术形式所产生的影响,而是将整个科技社会的技术创新和围绕技术创新的人类智力活动、企业组织、市场机制、实验制度都看作是蕴含特殊的“经济—权力”范式的新形态的一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全貌。

第三,技术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源于对新一轮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透视。毋庸置疑,技术是新一轮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量。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不是建立在国家主权基础之上,也不受民族国家疆域的限制,且完全适应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实现了全球性的资本生产循环。要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全球化必然谋求摆脱传统工业物质生产施加于其自身的各种限制和约束。因此,在生产方式上资本主义将信息化的生产摆在生产关系的核心位置,取代了传统工业生产中曾占据主导地位的工业物质生产。这种被称为后现代生产或信息化生产的生产方式建立在以知识、信息、交际、情感为要素的现代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之上,“经济的服务部门展现了一个生产交流更加丰富的模式。大多数服务的确以信息和各种知识的持续交换为基础。既然服务的生产导致确实物质的和耐用的物品,我们将这一生产所设计的劳动定义非物质劳动——即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①生产关系和价值积累机制的变化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走上了一条较之以往完全不同的道路,不再依靠外在的强制力量来消弭自身所遇到的反对力量,技术驱动的知识交流与信息交往的无边界性使得资本主义全球化

^①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 页。

成为无法阻挡的趋势,资本与技术的联姻呈现出复杂共生的关系,资本主义日益转变为“资本—技术”的复合体。鉴于新一轮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具有的这些新特点,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理论来帮助自身透视和理解上述变化,技术资本主义的提出未见得能给出一个实践上的最终方案,但至少从生产关系分析、价值理论分析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参考。

二、技术资本主义的特征与运行机制

技术资本主义概念投射出资本与技术 in 当代的深层次融合,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经济样貌、文化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总体性影响。围绕技术创新,技术资本主义建立了与传统工业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经济范式,构建了独特的“资本—技术”生态,并使得资本的演变能力和扩张力量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首先,这一变化体现在生产关系的重组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内容是围绕科技创新的资本增殖,表现为信息媒体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工业生产流程与生产内容的重塑和颠覆。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对信息技术与资本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重组关系作了最为系统的论述。他所提到的“信息技术范式”具有五个显著特征:一是信息构成了信息技术的“原料”;二是新技术的扩张性远超以往,已经普遍地渗透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文化结构之中,并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信息化和网络化。“在这种经济体内,单位或作用者(不论是公司、区域或国家)的生产力(productivity)和竞争力(competitiveness),基本上是靠它们能否有效生产、处理及应用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而定”^②;三是社会和信息技术的相互渗透与彼此关联决定了一个由每个系统或组织结成的“网络化逻辑”,“至于此种经济是网络化的,则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的增进与竞争的持续,都是在企业网络的之间互动的全球网络中进行”^①;四是网络化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弹性为特征,及具有组织结构上的灵活性;五是特定的技术逐渐聚合为高度整合的系统,这与后来的平台资本主义等概念在特征上相互呼应。上述关于“信息技术范式”的描述是一个典范,表明了当代技术资本主义建立在技术与科学以及非物质的商品基础上,也意味着与之相关的生产要素、劳动形式、劳动力结构的变革,知识和技术的相互促进成为技术资本主义内部所有社会关系的运作范式。从现实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经历了一轮轰轰烈烈的科技浪潮洗礼,虚拟货币、自动驾驶、云计算、区块链技术、信息自动化、3D打印等新兴产业技术的不断涌现、互联网“托拉斯”的崛起,都表明了建立在传统工业化机器应用和工业品制造之上的生产模式正日渐式微。从机制来看,技术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高度依赖于与科技创新紧密相关的社会活动,作为物权的专利、知识产权成为了生产活动产出的主要成果,人类无形的智力和创意必须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完成商品化的转变来服务于资本增值的终极目的。即使是在普通人看来与知识、创新毫无关联的农业生产,其物质商品也蕴含着远超以往的高科技元素——转基因

^②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①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技术和生物技术对现代农业的重塑已经使现代农业成为科技创新活动商业化的一个重要场所。技术创新活动的基础地位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组织权力结构的转变和高科技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彻底超越和掌控。

与这一变化紧密相关的是高风险的创新活动成为生产的核心内容。一方面,考虑到科技创新活动产出的不稳定性 and 高风险性,作为生产主体的高科技公司总是倾向于谋求对整个社会生产流程更高层次的掌控和垄断,构建平台式的商业技术网络,尽可能获取与智力活动相关的一切资源。另一方面,平台支持下技术的超大规模应用和海量数据的生产可以作为一种大规模社会劳动的结果,用于改进不变资本的支出,共享经济、外包经济、虚拟经济的崛起是此种变化的外在表现。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在今天的美国,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优步”自己并没有一辆出租车,最大的办公室租赁商 Wework 自己没有一平方米的办公室,最大的旅游住宿提供商“爱彼迎”自己没有任何房产。由于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智力劳动取代传统体力劳动成为劳动的主要形式,这导致了智力劳动权利进一步异化为一种与体力劳动权利相对立的知识阶级特权,导致劳动队伍走向离散化和片段化。资本增殖逻辑下的技术创新催生了对生产资源乃至生产身份的垄断,这也使得人们越来越担忧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正在创造一个技术拣选的阶层化社会。“当无线射频识别芯片被赞誉为超市及各大商店中最新的、获得巨大成就的网络产品的时候,那么大多数大商店和超市员工将流落街头。”^②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教育系统正在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培育着掌握了工程技能的各式人才,但不同经济阶层、族群的社会差异并不能随着教育大众化被彻底抹平,反而在技术资本主义时代进一步被撕裂和分化,衍生出“锈带”一类的社会问题。同时,在一个充分技术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智力劳动的生产者并不会使资本家对其更加依赖,反而由于自动化控制、人工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工作越来越可能成为一种奢侈的权利,使得劳动者甘愿接受延长劳动时间等苛刻条件来争取工作机会。从美国硅谷兴起的互联网加班文化、“996 工作制”无疑是新的技术条件下资本统治地位加强的一种真实状况。“企业主掌握着就业手段,也就是掌握着工人的生活资料,就是说,工人的生活依赖于他;好像工人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也降低为单纯的谋生手段了。”^①此外,技术创新的成果从属于企业和公司,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对资本和高科技公司的依赖,在当今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下人们再也难以想象出如当年瓦特单枪匹马通过改良蒸汽机而获得丰厚专利回报一般的神话。高科技公司尤其是跨国高科技公司虽然投入巨量资本用于专利研发,但科技研发本身已经被资本所招募,“知识垄断”借助专利保护制度、市场机制成为合法的垄断形式。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组进一步改变了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的价值积累与价值剥削形式,使技术资本主义社会更偏向于从知识和技术创新中抽取剩余价值。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非理性目的,表明了追逐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资本总是力图把所有的生产因素都纳入它的运行轨道及其统治体系之中,使它们服务

^② 福克斯、莫斯可主编:《马克思归来》(上),“传播驿站”工作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42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643 页。

于获取最大剩余价值这一根本目的。传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拥有各种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如延长工作日时长从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来加快资本周转速度,等等。然而在技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资本家还必须要通过其他一系列手段来保证充满高风险性、不确定性的科技创新活动能够产生额外的剩余价值。一种手段就是尽可能地利用信息技术、虚拟编码技术来加快资本的周转速度。众所周知,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带来剩余价值,运动的速度越快,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就越多,资本增殖的能量就越大,增殖的程度也就越高。马克思从资本循环与资本周转两个层面分析了产业资本的运转,揭示了资本家谋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技术路径,这些考察的结论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技术资本主义。借助信息技术和虚拟编码,发达国家的主要资本市场将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本质的物质劳动形式转变为虚拟的数字信息,资本不但借助这种虚拟经济形式获得了更强大的扩张能力和多样化的演变能力,还大幅度地缩减了资本的流通时间从而显著地加快了资本的周转速度。“相比以原子方式存在的资本,以比特形式存在的资本对流通不那么抵触。在数字形式下,资本可以以电磁波的速度循环,也就不再需要不同物质形式间的变化了,在资本循环中商品的流通仅仅是不同的电压和一个数字的增值上。”^②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种生产关系的重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既来源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也受益于发达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全球化市场的发展。这些因素共同促使当代资本主义不再受限于传统工业物质生产施加于其自身的各种约束,也不被工业生产的时空条件所局限,通过信息技术实现更快地创造和再创造。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不但使得商品形式走向虚拟化,还促成了金融资本市场的信息化变革,进一步地强化了资本增殖的力量。“资本积累及其价值创造,都在全球金融市场里进行,而这个市场则是由金融流动之无时间性空间里的信息网络所规定的。”^①正是因为技术加持下的全球资本流通表现出的瞬时性和无序性,卡斯特将信息技术赋权的资本金融市场称为“全球赌场”,在这个“全球赌场”里,有些资本在几小时、几分钟甚至是几秒之间,就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来回穿梭了一遍,而操纵几十亿资本游戏的则是熟练金融分析师和强大的电脑程序。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每当经济危机爆发和科技革命来临时,资本主义往往会进行重组。新技术、新剥削模式、新的组织形式、新的资本市场都会出现,创造出一种资本增殖的新途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力量,推动快速积累模式、弹性积累模式等新积累模式逐步取代传统的价值积累模式。按照 Luis Suarez-Villa 的分析,技术资本主义的新积累模式依赖于两种途径:一是隐性知识的积累,二是可编码知识的积累。隐性知识是那些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未书面化(或未标准化)的想法、经验、见解、规范或程序。此类知识通常具有广泛的文化基础,并形成于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隐性知识本质上也是社会性的,因为它是通过广泛的社会互动和社

^② 福克斯、莫斯科主编:《马克思归来(上)》,“传播驿站”工作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2页。

^① 罗斯·阿比奈特:《现代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技术和社会变革》,王维先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

会交往而积累的,受到社会规范、习俗和特定历史的影响,本质上是以大规模社会劳动为前提的。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大规模的社会劳动所累积的实践经验推动了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良,“在大多数场合又只有在存在着结合工人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并且往往要在更大规模的劳动下才能实现,因而要求工人直接在生产过程中达到更大规模的结合”。^②例如,开源平台上的软件研发大大推动了隐性知识的积累。这类知识的生产来源于集体,研发往往由来自于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独立研究者共同完成,他们彼此之间共享研究的经验、数据。借助“开源平台”集体共享、非独占性的特点,开源软件研发平台积累了大量本质上属于大规模社会劳动创造的实践经验。相比隐性知识,可编码知识则显得更加规范和标准化。规范和标准化知识、专利与各类知识产权都属于典型的可编码知识。可编码知识能够更方便地通过全球互联网传播,并以更成熟便捷的方式支持科技创新生产和再生产。上述两类知识作为非物质的资源为创意和创新的生产提供知识基础,技术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则通过将创意和创新转化为商品从而获得利润。

由于可资本化的知识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下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市场和企业谋求最大限度地将社会生活的一切内容进行知识化、虚拟化、信息化的转化,对各类知识(包括属于隐性知识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属于可编码知识的知识产权、专利)垄断性的占有,就成为一种必然。有学者认为,这场发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知识的资本化”并不意味着“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资本主义因为知识的天然公有性,从而演变为“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了,反而说明了当代资本主义正在从国家垄断走向知识垄断。^③知识垄断如同互联网时代的“圈地运动”,其核心特征是通过在全球或一定区域内对知识的垄断来获得超额的垄断利润,对知识资本化的渴求和技术资本主义走向全球化扩张的内在动力之一。鉴于围绕灵感、智识、情感、想象的人类创新活动与物质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异,创新的商品化有着较大的难度和较高的失败风险,服务于垄断创新的大型公司由此被赋予了全球性的权力来保障自身在科技研发领域和生产流通领域的决定性作用与独占地位。这构成了技术主义社会内部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全球性的、凌驾于公众与社会之上,占有大量专利、知识产权的高科技公司集群的产生和壮大,“其形成阻碍了知识产权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垄断组织与非垄断组织之间的自由流动,限制了知识产权领域平均利润的形成,从而使得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能够长期获取大大超过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④。以著名的“专利霸主”高通公司为例,国家发改委在2015年对高通垄断的行政处罚书中提到,高通公司滥用在无线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的支配地位,收取不公平的高价专利许可费,包括对过期无线标准必要专利收取许可费、要求被许可人将专利进行免费反向许可、搭售非无线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谋求超额回报的行为。与知识产权垄断具有相似内涵和特征的还包括数据垄断。数据垄断模式下数据具有和知识产权一般类似的地位,如同工业时代的劳动力、厂房、土地等生产要素。资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③ 伍静:《知识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的新形式》,《齐鲁学刊》2004年第3期。

④ 杨云霞:《资本主义知识产权垄断的新表现及其实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

本主义市场与企业把焦点集中在获取、解锁和开发利用新数据上面,像挖掘金矿一般不断从数据中获得改进生产效率,提升利润回报的算法。实践表明,数据信息交流的数量和质量确实与高科技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息息相关。通过海量数据的交互,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实验室、科技园区构成的科技创新网络像 18 世纪泰晤士河边的纺织厂一般源源不断地产生出商品化的创新成果。

三、技术资本主义理论的价值与意义

总的来说,技术资本主义理论揭示了以信息技术、基因工程、人工智能、自动化控制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塑和改造,图绘出了当代资本主义作为“资本—技术”综合体的基本面貌。技术资本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演化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形式、资本结构、商品类型、劳动形式,消费形态,以及社会各个阶级之间、公司与公众之间的关系都因为与新兴技术的深层次互动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技术资本主义理论一方面拒绝因循 20 世纪的纯粹批判道路和技术悲观主义立场,而是试图回归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道路,通过理论上对现代资本主义技术体制下所生出的全新生产关系的考察与分析,寻求实践上超越资本主义矛盾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技术资本主义理论辩证地分析了新兴技术、现代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全球化之间复杂的共生关系,试图摆脱单纯的技术决定论,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范围内来重新审视虚拟经济、共享生产、媒介符号编码、基因工程、数据平台等新技术产物与社会结构变革、资本流通的时空延展、经济范式转换、个体生活实践相互之间的互动影响,以此探究技术驱动下当代资本主义演化的内在逻辑。同时,技术资本主义理论也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其理论框架下的各种批判观点虽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强调新兴技术体制下剥削、异化等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并尝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探讨人之解放等问题,但它将技术创新置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最核心的位置,过分夸大了新兴技术形塑当代资本主义的功能和作用,将技术创新中的各类负面影响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体现出一定的偏见和局限性。因此,我们还不能将技术资本主义理论看作资本主义批判的社会理论的重建。不过,技术资本主义理论仍是有价值的,它为我们理解当代变化莫测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既不同于“文化—意识形态”分析,又有别于传统技术批判理论的分析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它还呼应和丰富了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和技术宰制下资本主义的工业资本积累的批判理论。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识技术资本主义概念下科技创新和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既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把握,也是对资本主义未来的一种展望。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新一轮的全球化演进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主导下的技术创新所推动的。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今天后工业时代的技术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资本的扩张和技术文化的渗透达到了惊人的、彻底的程度。资本与此类技术的广泛“联姻”在今天造就了一个彻底技术化、商品化的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无法抵

御其进攻,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那样,“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制造出一个世界”^①。以 5G 技术领导权为例,其已经脱离了单纯的技术创新范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被视作当代资本主义维护其全球经济范式的重中之重。对资本而言,这类技术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海量的信息资源和前所未有的广阔体验的同时,也推翻了国家疆界对文化、资本、技术扩张所设立的传统边界。与之相关的社交媒体软件、电子信息媒介的广泛应用不但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还导致了不同区域之间文化生态、经济生态丰富性的消失,为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和“中心—外围”式的全球经济、政治不平等格局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更不用说技术在赋予资本巨大渗透能力的同时还使资本的控制与垄断形式发生了隐蔽式的转变。技术资本主义理论视野中,那些拥有技术控制权、在全球范围内掌握着技术主导权的公司已不再是单纯的市场经济工具,而是资本驾驭社会和资本显现权力的一部分,甚至资本不再需要依赖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来控制整个社会。“维护技术垄断,借助垄断核心技术实现少数寡头跨国公司的统治,形成了全球性的寡头经济。同时,这些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不仅作为独立的经济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而且还作为一种隐性的政治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结合的强大的力量。”^②Luis Suarez-Villa 在《全球化与技术资本主义》中辩称,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将这一全球社会经济体系带入了一个重要的新阶段。他认为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已经相继经历了重商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等阶段。在这些阶段里,商业交易、工业生产以及金融投机活动分别被确定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走向全球化的技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漫长进化历史中的全新形态,是资本主义不断寻求突破利润、增长、积累边界的必然结果。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和技术资本主义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一方面,对技术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扩张最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知识产权乃至整个产权制度发展的促进。对新自由主义来说,产权就如同史前时代的石斧一样重要。新自由主义通过各类公司、企业组织贪婪地寻求将一切资源转化为可以被占有的财产。任何可以创造利润的事物,不管其是有形的物质还是无形的智力成果都在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进程中被定义为可使用的资源。这就使得整个资本主义变得更加“无形”,更加依赖知识产权和智力成果。技术资本主义为新自由主义的扩张提供了通过科技创新和智力成果转化为财产的路径,因此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范式都是建立在技术资本主义之上的。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为技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新自由主义的旗帜是“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个体自由”,虽然资本主义社会诉诸这类话语的社会行动的结果往往是企业霸权的建立、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工人阶级和贫困群体就业权利的被剥夺,但富裕的社会阶层和掌握市场经济资源的大型企业也同时得以通过自由贸易、自由市场攫取更多的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5—36 页。

② 贾利军:《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下的技术创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7 页。

济权利,甚至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种超然力量。“总体而言,新自由主义作为全球力量的崛起为技术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奠定了条件。公司权力在全球的扩张和资本的流动使得前所未见的、超高效的积累成为可能,而这恰恰是资本主义机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资本的积累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新的金融工具为科技公司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风险投资,使得它们最终成为了全球性的强权。”^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将“数字鸿沟”“技术霸权主义”、全球环境保护、滥用知识产权等问题都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与科技创新相关联的框架下去重新审视,辨析不同社会制度下技术创新理论与路径选择背后隐藏着的制度、道路抉择。

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技创新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科技创新的本质差异,制定符合我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科技创新战略,也是当下一个迫切的任务。技术资本主义理论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诠释了当代资本主义与技术创新的内在逻辑,因此它还有助于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技术创新理论出发来分析认识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创新实质,更明智地处理与科技创新关联的国际政治博弈,制定更理性科学的产业科技创新策略。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强调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在一个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我们的科技创新事业同样可能面临社会不平等、劳工阶层分化、信息贫困、资本与大型跨国企业凌驾于社会公众之上等潜在风险。在借鉴新的理论成果反思资本主义弊端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发扬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效规制技术革命的无序资本化扩张,将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长期课题。

(责任编辑:刘君)

^① Luis,S., *Globalization and Technocapitalis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rporate Power and Technological Domination*.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17.